

1. 前言

外人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簡稱 FDI) 在一個國家尋求經濟成長與發展的過程之中, 往往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是對於開發中國家, 由於開發中國家資金缺乏、技術落後, 因此, 外人直接投資一方面帶來豐沛資金彌補國內資本累積之不足, 一方面可經由新產品或新生產技術的引進, 所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 使得本國廠商生產技術得以提升並增加競爭力。而促成外人直接投資的因素, 除了投資國廠商基於成本、市場或是關稅的考量決定是否採取 FDI, 此外地主國政府對於 FDI 的態度, 更是影響 FDI 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以我國為例, 我國於民國 40 年初期即開始鼓勵外人投資, 而為吸引外人對我國投資, 相繼推出許多獎勵措施諸如「外國人投資條例」、「外匯貿易改革方案」、「獎勵投資條例」、「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以及後來民國 80 年初期用以取代原「獎勵投資條例」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政策。這些政策制訂之目的, 不外乎是想藉由租稅優惠或是改善投資環境的方式, 吸引外資進入我國投資, 以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此外, 根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 (UNCTAD) 所發佈的《2007 年全球投資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 指出,¹大部分國家政府還是繼續採取促進 FDI 的政策, 相關統計資料如下表 1:

¹ 為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之簡稱

表 1：會員國相關政策立法變遷,1997-2006

項目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提出相關 政策國家 數	76	60	65	70	71	72	82	103	93	93
相關政策 數目	150	145	139	150	207	246	242	270	205	184
較傾向 FDI	134	136	130	147	193	234	218	234	164	147
較不傾向 FDI	16	9	9	3	14	12	24	36	41	37

資料來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

由表 1，以 2006 年為例，地主國政府共制訂 147 個相關政策以促進 FDI，而報告中指出，其中由開發中國家提出的佔 74%，可見開發中國家政府基本上對於 FDI 態度是傾向開放。探究其原因，不外乎外人直接投資可使地主國廠商受惠技術外溢效果，提升生產力與競爭力，同時藉由國內消費量的增加，提昇國內消費者剩餘使得本國福利上升，此外政府稅收亦可因廠商的利潤增加而增加。而本文目的即試圖由理論角度，對一國政府面對是否採取促進 FDI 政策的選擇，作進一步的探討。

此外，討論外人直接投資對地主國生產力與技術影響的相關文獻方面，結果大都支持對地主國技術會有正面的影響，如 Young (1992) 發現新加坡以及香港金融服務業發展的成就，要歸因於政府面對外人直接投資採取積極獎勵的政策；而 Blomstrom & Person (1983) 以 1970 年代墨西哥的產業資料，且以製造

產業為例進行分析，並發現外人直接投資的結果，支持技術外溢效果的存在，且本國廠商與外國廠商的技術差異越大，外溢效果愈明顯。Chuang & Lin (1998) 運用台灣的資料分析台灣，外人直接投資對於台灣的生產力，確實帶來正面的影響。另外 Glass & Saggi (2002) 一文假設外商進行 FDI 投資下，外國廠商比起地主國廠商，擁有優越的技術，而為了防止技術會隨著員工跳槽到地主國廠商而外流，外國廠商會願意付較高的薪資貼水，以防止員工跳槽，如此一來提高本國員工薪資，另一方面，就算還是發生員工跳槽到地主國公司導致技術外流的情形，對於本國政府而言不論是何種狀況，皆會有誘因使得本國政府傾向獎勵 FDI。

其次，更進一步研究的文獻，包括 Wang & Blomstrom (1992) 一文中，假設給定技術水準且把技術的外溢效果內生化，進一步分析技術水準的改變對廠商進行直接投資的影響。而 Helpman、Melitz & Yeaple (2004) 建立一個模型，假設一產業中存在不同生產力的廠商，而這些廠商可以選擇將產品在國內銷售、出口、或是採取 FDI 的方式在國外市場銷售，結果發現生產力最低的廠商會被迫離開這個產業，而生產力較低的廠商只把產品供應國內市場，而其他生產力較高的廠商則是可以把產品同時供應國內與國外市場。邱俊榮與蔡宜臻 (2006) 考慮一勞動與技術兩投入要素的不完全競爭模型，並藉以探討廠商進行直接投資對其研發意願的影響。

以上文獻大都是以針對地主國以及外溢效果的研究，亦有針對投資國以及外國廠商決策的文獻。討論外國廠商決定 FDI 的考量，如同前述，可能基於市場、成本或是關稅，若是基於逃避關稅考量，稱為躍過關稅 (tariff-jumping)。Bhagwati et.al. (1992) 指出地主國政府的貿易障礙，會促使外國廠商採取 FDI，也就是存在一物換一物 (Quid Pro Quo) 的關係，因此是否採取 FDI 變成外國廠商與地主國政府協商放寬貿易限制的籌碼。Grossman & Helpman (1996) 以前述的概

念，建立模型並作進一步討論。而邱俊榮與劉惠玲 (2003) 加入市場不確定性，討論廠商在面對地主國市場需求不確定的情形之下，不確定性對廠商決策的影響，而文中指出無論是獨佔或是雙佔的市場結構，市場不確定性的存在均會降低廠商到地主國直接投資的意願。此外，Qui & Tao (2001) 納入地主國政府對於自製率訂定的考量，且假設地主國不存在下游廠商且地主國政府關心國內廠商技術的提昇，探討地主國政府訂定的自製率如何影響外國廠商是否選擇直接投資進入本國市場或是採取出口商品的決策。

接著，綜合以上所述，不論是針對 FDI 是否存在技術外溢效果或是外國廠商作是否進行直接投資時的考量，地主國政府都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換句話說，地主國政府是否支持外人進入本國投資，對一項投資計畫能否順利推行有著重大的影響力。本文就將以政府如何決策作為基礎，並採用 Grossman & Helpman (1994) 所發展的政治獻金模型為架構。該模型主要描述利益團體利用政治獻金以影響政府制訂對其有利的政策，而政府一方面收受政治獻金以籌措競選經費，但另一方面又必須關心國內福利，以一定的政績爭取連任。故政府的目標在於極大化政治獻金與國內福利的總和，即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將會對政治獻金與國內福利作折衷取捨。

此後，許多學者延續 Grossman & Helpman 的政治獻金模型，並藉以探討當政府面對利益團體遊說時，將如何制訂各種政策。如：Aidt (1997) 分析當利益團體的議價能力強弱將如何影響政府制訂貿易政策。而 Konishi et al. (1999) 允許國內與外國廠商參與遊說，且說明政府在制訂貿易政策時，會較偏好自動出口設限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 相對於關稅政策，而會有如此結果是由於當政府較重視政治獻金相對於本國福利時，那麼採取自動出口設限將會得到較多的政治獻金。Mitra (2002) 討論當政府可以選擇是否加入自由貿易協定之下，本國廠商如何透過遊說影響政策制訂。Magee (2002) 討論當廠商數眾多，那麼利益

團體透過政治獻金遊說政府時，將會存在遊說搭便車（free rider）的問題。

最後，國內亦有許多政治獻金相關文獻如：林奇蓉（2004）探討廠商遊說對策略性出口補貼以及策略性進口關稅的影響。賴育邦（2005a）指出雖然環境污染減量補貼可使得污染排放量減少，但在加入利益團體遊說之後，利益團體會用較高額的政治獻金以爭取高額的補貼，如此一來實際補貼水準將會大幅偏離最適補貼水準，而使得補貼變得無效率。賴育邦（2005b）討論在資本具高度移動性下，利益團體如何影響政府制訂環境政策。王智賢與蔡坤良（2006）探討面對政治獻金限額時，利益團體的政治獻金及關稅提案價格如何改變，以及是否真的達到改善社會福利的目的。王智賢與翁永和（2006）分析利益團體如何藉由政治獻金以影響政府制訂自製率的政策，並得到廠商提供之政治獻金多寡以及自製率的高低，會受到政府對全國福利水準重視程度高低的影響。Wang et al. (2006) 討論兩資源對立廠商如何藉由遊說影響政府制訂政策。賴育邦（2006）將初期污染排放許可分配比率的問題納入考慮，並分析新舊污染源的相對遊說效率對社會福利的影響。而王智賢與林惠敏（2007）分析利益團體如何藉由政治獻金的捐獻來達成影響政府制訂最適污染管制政策的目的。至此，我們可以發現由於模型設定貼近現實，而且易於操作分析，故受到國內、外學者廣泛運用至各種不同的議題。

本文之章節安排如下：第 1 節為前言，第 2 節在於說明本文模型架構，並採 Grossman & Helpman (1994) 之政治獻金模型，探討本國政府在面對本國與外國廠商遊說時，如何來訂定最適關稅水準，以期達到國內福利以及政府效用極大化。第 3 節則在不考慮廠商遊說與政治獻金之下，直接開放外國廠商進入本國直接投資，並比較此時本國政府獲得的效用與考慮遊說之下之政府效用水準，以探討本國政府會選擇開放與否。最後，第 4 節為本文結論。